

关于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哲学反思

肖 前 陈志良 杨 耕 主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Y11-1140

关于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哲学反思

肖 前 陈志良 杨 耕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 肖前等主编 .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ISBN 7-300-01866-1/B · 208

I. 关…

II. 肖…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6528 号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肖前 陈志良 杨耕 主编

出版 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 39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375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7 000 册数：1-2 000

定价：5.00 元

编 者 说 明

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玄思冥想，不关注现实的哲学没有生命力。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要关注现实，将理论触角深入到现实深处；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忽视对自己时代的现实实践进行批判考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实践“绝缘”，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孤立而走向枯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是当今中国首要的和基本的现实，实现现代化体现着几代中国人的探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认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引发对民族历史、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在联系现实的同时，哲学不应把自己降低为现实的附庸，不应失去自己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独立性，不应失去自己的反思特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当今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只能责怪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无知。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本书不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客观描述，也

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去图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号入座”，而是力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哲学的视角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故本书名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我们注意到，历史中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只有在其充分发展、充分展现后才能被充分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拉开“序幕”，我们便对此进行哲学反思，的确有较大的难度。然而，正如歌德所说，“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不去寻找困难”。所以，我们知道而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哲学思考，并向读者献上这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马克思说过，由于某种判断盲目，人们往往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所以，当我们把本书献给读者时，我们丝毫没有轻松感，我们感到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是肖前主持的国家教委博士点项目。参加此项研究和本书写作的是：肖前、陈志良、杨耕、王建国、马俊峰、郑伟建、李燕、王晓升。全书由肖前、陈志良、杨耕统稿，肖前定稿。

编 者

1992.12

卷本·真凶

目 录

导论 国情、认识和现代化.....	(1)
一、国情认识的历史轨迹及其反思.....	(1)
二、国情认识的哲学分析.....	(8)
三、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	(12)
四、国情与现代化	(18)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22)
第一节 历史的规律和主体的选择	(22)
一、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2)
二、主体选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6)
三、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的历程和特点	(30)
第二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32)
一、马克思的设想与中国国情	(32)
二、“苏联模式”和中国现实.....	(34)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7)
四、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般与个别 的关系	(39)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43)
第一节 现代化——人类文明的转轨	(43)

一、现代与现代化	(44)
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把握现代化	(46)
三、现代化与西方化	(51)
第二节 中国人认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55)
一、现代化意识的朦胧涌现	(55)
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交汇	(58)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63)
第三节 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辩证性	(66)
一、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	(66)
二、把握目标要注意的几种关系	(70)
三、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75)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80)
第一节 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	(80)
一、社会结构分析的一般方法	(80)
二、社会结构的一般考察	(83)
三、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一般状况	(86)
第二节 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88)
一、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方式	(88)
二、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特色	(91)
三、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理论指导的 反思	(94)
四、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哲学视角	(98)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运行机制	(102)
第一节 建构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	(102)
一、社会运行机制的内涵	(102)
二、建构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原则	(105)

第二节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运行机制.....	(108)
一、当今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现状.....	(108)
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运行机制 的确立.....	(110)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和主体.....	(119)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系统.....	(119)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动力系统的内涵.....	(119)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动力系统的结构性 与功能性.....	(124)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动力系统的运行 机制及其整合.....	(126)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	(130)
一、确立现代化主体的基本原则.....	(131)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主体的确立和构成.....	(135)
三、实践主体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139)
四、实现主体现代化.....	(142)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146)
第一节 世界现代化的基本类型与中国现代化 的艰难起步.....	(146)
一、世界现代化的基本类型及其启示.....	(146)
二、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	(153)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的反思.....	(157)
一、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及其二重 化.....	(157)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及其哲学 透视.....	(164)

第三节 当今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和民族	
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	(170)
一、当今中国现代化的难题和出路.....	(170)
二、民族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	(174)
结束语 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179)
一、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对民族 历史的影响.....	(179)
二、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走向社会主义.....	(184)
三、在世界历史的行列中走向现代化.....	(189)

导论 国情、认识和现代化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历史形成的客观国情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现实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有待于科学理论对于现代化实践的正确指导，而用以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科学理论，须以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为基本依据。因此，若要建构科学理论以正确地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就不能不认清中国的国情；为认清中国的国情，就必须研究如何认清国情的问题。

一、国情认识的历史轨迹及其反思

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在人类历史舞台上重新寻找并确立民族本体应有的位置，这是 20 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思考的主题。辛亥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夭折，使中国人再度陷入苦恼和迷惘之中。十月革命的炮响震撼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孙中山从中看到了希望，明确指出“以俄为师”。毛泽东从中透视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并以此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命运，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孙中山和毛泽东实际上都在探索一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然而，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中国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绝非易事，其首要的前提就是要正确地分析和解答中国的国情问题。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思想登山之路。

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初步接触到了国情问题，并对中国国情的某些方面有了一些比较正确的认识。但是，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却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例如，他们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仅仅看作是国际资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的对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同外国资产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差别。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尚缺乏科学的认识，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国情缺乏扎实的调查和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也不充足。直到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才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比较正确的分析。“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指出，中国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与其相适应的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统治。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然而，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又变得模糊起来了，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统治的支柱，并进而认为应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先后出现了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悲观思想，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无论左倾冒险主义，还是右倾悲观主义，都没有客观地估量中国的政治形势，更没有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为估量形势、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认为，中国国情的实质，就是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从这一实质出发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才能正确地估量政治形势和制定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把握，以及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诸方面具体国情的正确分析，使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包围城市”等著名理论，从而科学地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道路和形势等紧迫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关系等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又一次突出了认识国情的问题。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抗日战争能否胜利，能否速胜，却是一个必须比较中日双方国情以及分析世界形势才能解答的问题。作为一位辩证法的大师，毛泽东深深地理解这一点。正是在对中日双方国情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日民族的矛盾解决了，中国人民同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政权的矛盾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对此，中国共产党有清醒和成熟的认识，毛泽东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和正确的解答。依据当时的国情，毛泽东否定和排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异常软弱，不能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同样，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为当时的国情所不容许，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未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任务之前，社会主义革命不具有现实意义。在毛泽东的思维逻辑中，中国革命的前途导源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因素，而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根据，则在于认清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1952年底，中共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又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问题。“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十大关系”的提出，是以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为前提的。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估量和分析：（1）宣布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2）科学地指出，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3）初步指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八大”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其意义十分深远。

“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认识，进入了曲折发展的十年。仅隔一年多时间，八届三中全会就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轻率改变“八大”路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原因则是对变化着的国情缺乏基本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缺乏实践经验。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了脱离实际的判断，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就可提出向共产主义过

渡的任务，结果造成了超越发展阶段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造成这些重大失误的主要认识原因是：无视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实际国情，生搬硬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以“超大、超公、超优越”的空想模式来指导社会主义起始阶段的建设。之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但这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在实践上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在理论上还保留着许多“左”的观点。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工作重心的果断转移、改革任务的及时提出，以及“三个经济带发展不平衡”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等等，都是以历史和现实的国情为基本依据的，反过来又为理解和深入地认识国情提供了理论观点上的指导。

国情认识的历史表明，认识国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认识国情的过程中，认识路线、认识方法、理论观点以及政治立场都参与认识过程，并对认识结果产生不容忽略的影响和作用。分析这些因素在国情认识历史上曾造成的失误，可为今日认识国情的鉴戒。

第一，国情认识历史昭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认识路线：一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二是从本本或权威意见出发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抗日持久战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成功地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进一步而言，理论的正确程度与是否彻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密切相关的。

在国情的认识史上，由于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而导致理论错误和实践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其中，富有典型性的案例莫过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等人从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公式”出发，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的经验，完全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国情而去侈谈革命的性质、估计革命的形势和设想革命的道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化了，不懂也不愿意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以为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殊不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特殊的复杂问题。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是以先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为思想基础的，因而从认识论根源上看，是认识路线的根本错误导致了政治路线的重大错误。

第二，国情认识史表明，正确的认识方法是认清国情的必要条件。

错误的认识方法必定导致国情认识的错误。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就是由认识方法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所造成的，即二者都看到了一部分真实情况，但都把片面的东西当作全体，把臆想的东西当作客观真实，因而都未能客观和全面地反映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和总体状况。不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国情。要认清国情，就必须精炼我们的认识方法，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

第三，国情认识史表明，认清国情需要有正确的理论观点指导。

在认识国情的过程中，如果撇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错误理论观点的指导，或陷于狭隘经验的

小天地，这样就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的国情。正确的理论观点之所以是认清中国国情的必要因素，这是因为：

(1) 要认清国情，就得对中国国情作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全过程中，必须确定调查研究的对象、项目和计划，必须整理和分析经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并描述和解释国情资料，使之形成国情知识的系统。离开了理论观点的指导，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调查研究；若无正确的理论观点指导，则不能获得正确的调查结果。

(2) 正确的理论观点已受到一定阶段和一定范围内的实践检验，如果理论观点因时空的变化而失效，那么，通过对它的进一步检验而限定它的范围；如果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则可以通过实践检验它的错误性质，并用较为正确的理论代替它。

(3)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提出了可以用来观察、描述和解释国情的概念体系，对于国情的认识理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然，正确的理论观点对于认识国情的指导作用不是包办代替，也不是先验地让结论跑到调查研究之前，而是使调查研究明确目的和意义，使描述和解释国情的事实成为可能。

第四，在认识国情的过程中，政治立场对于国情认识的作用不容忽视。

政治立场通过对理论观点的选择和运用，间接地作用于国情认识，从而影响着国情的认识结果。例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各党派对国情的认识表现为政见上的针锋相对和论坛上的众说纷纭，考察它们的国情认识，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而造成国情认识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立场的作用。国民党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选择和运用旧三民主义理论，有意地歪曲中国的国情。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有意模糊中国社会的性质，起初说中国是没有封建制度的封建社会，后

又改口说是“封建制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最后又说中国既是后期封建制度时期，又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可见，反动的政治立场必定选择错误的理论观点，不可能真实和全面地反映国情；而进步的政治立场，则有可能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理论以认清国情。

国情认识史上的经验教训启迪着后继的国情认识者们：为了真正地认识国情，必须解放思想，突破先入之见；为了突破先入之见，又必须接触并深入实际。为此，我们要不断地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同时又要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剔除脑子里那些不正确的先入之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是从实际出发。只有同时在这两方面作出努力，唯物主义才不会束之高阁，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

二、国情认识的哲学分析

从哲学的视角分析国情，应首先明确国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国情概念的内涵就是国情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独特性质。

首先，国情具有客观现实性。

国情是人类社会特殊组织形式——国家的现实情形。国情作为客观存在的现实，是国情认识者的认识对象和认识内容。国情包括社会存在以及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等情况。如果把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排除在国情之外，就会破坏现实国情的整体性，亦不能全面地把握现实国情。既然国情既包括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又包括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和文化的因素，那么，就不能把国情的客观现实性等同于社会存在的客观物质性。但是，国情中的政治和文化因素，不是什么纯粹的精神过程，而是现实的存在，是与社会物质力量紧密结合、体现社会性质的现实状况。因此，国情的客观现实性既不同于认识者的主观精神状态，亦区别于社会物质生活